

晚清女性價值觀之嬗變與重構*

何 瑋

華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概要：晚清時節，“廢纏足”、“興女學”運動的興起意味著女性價值觀迎來了轉型期。這一轉型具體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過程，推動其實現的社會力量又源自何處？通過對歷史脈絡的梳理可以發現，西方傳教士對纏足習俗的質疑及對女學的倡導揭開了轉型序幕，其後在維新派、革命派及開明士紳階層的積極推動下，迎來了“廢纏足”、“興女學”熱潮。清政府對女子學校教育的認可及制度化使女學建設獲得了正統性及話語權。至此，近代學校教育取代纏足，成為“女性美”新的價值標準。儘管近代女子教育的興起其背後有救亡圖存的政治意圖，但是，它使女性進入社會公領域成為可能，對重塑女性生活影響深遠。

關鍵字：晚清；近代女子教育；纏足；價值觀；启蒙话语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s for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i 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 *Arou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ise of movements, such as ‘anti-foot-binding’ and ‘establishing women schools’,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ndards for women. In that case, what kind of historical process had the transformation undergone specifically? Where did the social power, which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that transformation, come from?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the suspicion about the custom of foot-binding and the support for women school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usher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Then, with the active support of the reformists,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enlightened gentry, a upsurge of ‘anti-foot-binding’ and ‘establishing women schools’ had appear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pprov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e school education of women, which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schools to gain the orthodox position and the rights of making their own decisions. The education of modern school, replacing foot-binding, has become a new criterion for “the beauty of female”. Although behi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of women, there were the political intentions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that rise, which made it possible for women to take part in the public affair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remolding the life of women.*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odern education of women; foot-binding; foot-binding; the standards for women;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本文系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3YJCZH051）及中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WS1322001）階段性成果。

1. 前言

鴉片戰爭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迫使清王朝告別閉關鎖國時代，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從文化層面看，西方傳教士、商人大量湧入，以他們為載體的西方文化不斷衝擊中國固有的價值觀念及華夷秩序，傳統的女性規範由此步入轉型期。越來越多的人士開始關注到女性的纏足現象，揭起“廢纏足”、“興女學”熱潮。針對這一歷史現象，近年來諸多學者予以關注（廖秀真，1988；林維紅，1993；呂士朋，1993；杜學元，1995；夏曉虹，1998；Ko, Dorothy, 2001；高嶋航，2003、2004；楊念群，2004；東田雅博，2004等）。夏曉虹的研究指出：今天的學者多將廢纏足運動與女子教育的興起作為兩個不同的事物分別闡述，而在清末維新派知識分子中間，二者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夏曉虹，1998：39）。這為我們思考女性規範的轉型提供了寶貴線索，即廢纏足與女子學校教育的興起均在女性規範轉型過程中承擔了重要角色，且二者之間密不可分。

問題在於：近代學校教育取代“纏足”成為彰顯女性身份的新標記經歷了怎樣的歷程？前近代彰顯女性社會地位及女性美的“纏足”又是如何蛻變為“畸形”與“殘疾”的象徵？換言之，女子學校教育的旭日東升與纏足之風的江河日下，具體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過程？推動這一轉變發生的主角又是誰？以往的研究鮮有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基於此，本文將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解析。

2. 西方傳教士唱響的“啓蒙”序曲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隨著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和廣州成為通商口岸，外國傳教士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女性的纏足習俗由此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在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創辦的《萬國公報》上，許多傳教士認為這一習俗不可思議，他們或援引基督教教義，或從近代醫學等的角度進行批判。當然，讓傳教士們確信纏足是“陋習”的還有東西方之間明晰的權力關係，以及風行一時的社會進化論。不僅如此，傳教士們還積極付諸實踐，1874年在廈門創辦“天足會”，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不纏足組織。

致力於“陋習”的革除之外，傳教士們還從男女平等、近代國家建設等角度宣傳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積極嘗試創辦女學堂，出現了“教會所至、女塾接軌”¹的局面。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社”會員藹爾特稅（Miss Aldersey）在甯波開辦的寄宿制藹爾特稅女子學校（Aldersey Girls' School）是中國大陸有據可查的最早的女子教會學校。但是，由於“男女授受不親”等固有觀念依然有強大的影響力和束縛力，再加之人們對“洋教”有戒備心理，女學堂在創辦初期非但沒有被大眾接受，反而招致不少鄙夷的眼光。為了讓更多人家將女兒送入學堂讀書，傳教士們想盡各種辦法，如免收學費、膳宿費，供給衣服、路費，甚至向學生及其家屬發放補貼等，無奈收效甚微，富庶之家多不願將孩子送來讀書，女學堂招收到的大都是希望得到救濟的貧困家庭兒童（羅蘇文，1996：69；戚世皓，1988：554）。早期教會的女學建設發展緩慢，1844-1860年的16年間，外國傳教士在五個通商口岸設立的教會女學僅有12所（俞慶棠，1981：344）。

教會的女學建設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迎來轉機，於19世紀90年代成功走出招生難的困境（高嶋航，2004：285）。究其原因，其一：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按照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傳教士可深入內地自由傳教，地方官對傳教者與教徒均須保護。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著有更多的民衆可以接觸並了解基督教

¹ 梁啓超“倡設女學堂啓”，《飲冰室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p. 20（1936/1989）

義。其二：洋務運動的興起推動了人們對西學態度的轉變，在客觀上改變了人們對教會女學的態度。洋務派人士對近代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給予的肯定，創辦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福建船政學堂等西式學堂致力於新式人才的培養，聘任傳教士擔任學堂要職等舉措，一方面讓傳教士及教會學校獲得了比以往更為寬松的社會環境，更為重要的，反映出洋務派對西學、西方傳教士的信任之情。在上述社會氛圍的推動下，普通民衆對教會女學的態度也趨于改變。再加之教會女學也在努力迎合大眾需求，教授如紡織、縫紉、園藝、烹調等有助于實際生活的知識技能，教會女學建設的腳步由沿海地區向內地延伸，數量上也呈現急劇上升的態勢（羅蘇文，1996：69；杜學元，1995：268-270）。

積極宣傳基督教義，試圖用基督教思想改造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習慣乃至思維方式，也許是教會女學建設的初衷。儘管如此，作為最早為中國女性提供近代學校教育的機構，它的出現為日後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範式，為中國男性知識分子重新思考、定位“女性”這一社會性別角色提供了思想資源及實踐經驗，其誕生的意義不容忽視。同時，教會初期的女學建設與反纏足運動緊密相連，為中國女性價值觀的轉換譜寫了“啓蒙”序曲。

3. 中國男性知識分子主導的“啓蒙”話語及實踐

與傳教士“啓蒙”的腳步相伴的，是中國愈趨暗淡的前途命運。甲午戰爭的慘敗令知識分子飽嘗內憂外患、存亡絕續之秋的味道，探究國勢衰微的原因已然成為義不容辭的責任。

3.1 維新派的言論及實踐活動

慨歎“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²，梁啓超將國家前途命運的黯淡歸咎于女學的衰微。女學不振使兩萬萬女子“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³，她們成為國家的負擔，國富民強道路上的絆腳石。不僅如此，母親本應在幼兒啓蒙教育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女學不振導致女性不能實施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們無法勝任培養下一代國民的職責，所謂“孩提之童，母親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⁴。《變法通議·論女學》中，梁啓超從國家興衰的角度出發，強調發展女學的重要性及緊迫性。在他看來，發展女學首先要割除傳統的纏足習俗。

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于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⁵

男性一日醉心于纏足、一日視纏足為美，則欣賞纏足者（男性）與被欣賞者（女性）都不會把注意力從纏足轉換到女學上來。必須從觀念上改變人們以往視纏足為美的審美意識，繼而才能將民衆的注意力吸引到發展女學上來。換言之，梁啓超認為女學真正的發展取決于人們審美價值觀的轉換，這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關於這一點，《大公報》上的探討更加直截了當。“為今之愛國保種計而欲強國力，先宏教育；欲宏

² 梁啓超“論女學”，《飲冰室文集》第1冊，中華書局，p. 38（1936/1989）

³ 梁啓超“論女學”，《飲冰室文集》第1冊，中華書局，p. 38（1936/1989）

⁴ 梁啓超“論女學”，《飲冰室文集》第1冊，中華書局，p. 40（1936/1989）

⁵ 梁啓超“倡設女學堂啓”，《飲冰室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p. 44（1936/1989）

教育，先興女學，欲興女學，先禁纏足。蓋教育者，強國之母也；女學者，教育之基也；纏足者，破壞女學之洪水猛獸也。”⁶

為了讓不纏足理念為更多的民衆接受，維新派人士積極利用報章媒體進行輿論引導和宣傳，《時務報》、《湘報》、《知新報》、《女學報》等成為當時宣傳不纏足運動的重鎮。此外，他們還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在上海、廣東、福建、湖南等地相繼成立不纏足組織，得到不少士紳階層的積極響應與參與（林維紅，1993：223-224）。如此努力宣講和實踐的結果，終於迎來了1895至1897年間“廢纏足”的第一陣熱潮。

推動“廢纏足”運動開展的同時，維新派人士也在積極籌備女學校的創辦。他們討論開設女學所需費用，構思女學堂章程及課程設置，並上書南洋、北洋大臣彙報籌辦情況，申請補助經費，最終得到南洋大臣劉坤一的支持。經過精心籌備，1898年梁啟超與康廣仁、鄭觀應、經元善等人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名為“桂墅裏女學會書塾”出現在上海城南，宣告了第一所由中國人創辦的女學堂的誕生。

開設之初，女學堂的規模微乎其微，僅招收到16名學生。弱小的存在卻沒有因此而逃離守舊派的視線，戊戌變法失敗後，在頑固守舊官紳的強烈反對下，最終還是難逃停辦的命運。針對這所女校，社會上混雜著期待、贊許、質疑、謾罵等各種聲音，最終還是負面論調占據了上風。但是，它吸引了更多的人關注女學，其誕生讓維新派主導的“啓蒙”話語又向前邁出了堅實一步，為民衆、尤其是開明士紳開啓了拯救女性進而拯救國家的希望之帆。從這一角度而言，這所女學堂的出現可謂是女性價值觀轉換路途中一個標志性事件。

3.2 革命派“女權”論思潮的登場

就在維新派人士緊鑼密鼓地為重新書寫女性規範積極努力之際，革命派人士的參與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功效。有過留日經歷的馬君武在1902年將其翻譯的《斯賓塞女權篇》及《達爾文物競篇》收錄成書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西方女權思想的譯著。與此同時，還湧現出一批通過辦報宣揚女權思想的革命派人士，丁初我等人于1904年創辦的《女子世界》，秋瑾創刊的《中國女報》（1907年），陳以益等開辦的《神州女報》（1907年）及《女報》（1909年）等，均在這一時期登上了歷史舞台。

金天翮⁷執筆的《女界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中橫空出世，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從多個角度集中探討婦女問題、倡導女權思想的專著。1903年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後，幾個月內即告售罄。這部以“啓蒙”色彩著稱的女權專著用高亢的筆調、激昂的言辭宣告破舊立新已迫在眉睫，強調必須對女性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全書從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權利、參與政治和婚姻進化論七個方面展開，要求女性破除“裝

⁶ “論纏足與女學之關係”，大公報（1905-11-19）

⁷ 金天翮（1874-1947），原名懋基，字松岑，號鶴望、鶴舫，後改名天羽，別署麒麟、愛自由者、金一、天放樓主等。江蘇吳江縣同裏鎮人，與陳去病、柳亞子並稱“吳江三傑”。金天翮自幼跟隨名師學習詩文，後入讀江陰南菁書院，國學功底深厚。其後對近代西方思想及制度、尤其對近代教育、女權思想等頗有見解及心得。1902年參加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創辦的中國教育會，並在同裏組建中國教育會同裏支部。1903年加入興中會，同年應蔡元培之邀赴上海愛國學社工作。1902年在同裏創辦新式學校同川學堂，1904年又斥資創辦明華女學校，是吳江縣第一所女子學校。1903年出版《女界鍾》，並與薛鳳昌合作翻譯宮崎寅藏（宮崎滔天）自述參與孫中山革命活動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為留日學生刊物《江蘇》撰稿，在該刊上發表小說《孽海花》，1904年丁初我在上海創辦《女子世界》，金天翮成為主要撰稿人。民國後歷任江蘇省議員、吳江縣教育局局長、江南水利局局長等職。1932年與章太炎等在蘇州創辦國學會，共同講學。抗戰期間曾任上海光華大學中文系教授。1947年1月病逝。著有《孤根集》、《天放樓詩集》、《天放樓續集》等多種詩文集。

飾之害”、“迷信之害”、“拘束之害”及“纏足之害”，從以往醉心于梳妝打扮、封建迷信，沈溺于纏足舊俗的“可悲”狀態中解脫出來。談及婦女纏足時，金天翮以“外部纖仄，內容腐敗，未見其高尚也”⁸來表達不以其為美的緣由，並以“宛轉呼號，求死不得，血肉穢臭，肢體摧殘”⁹形容女性幼時因纏足體味的痛苦，稱其是比非洲婦女壓首、西洋婦女束腰更為殘酷的“惡俗”。“自古滅種亡國，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為，今吾中國吸煙纏足，男女分途皆日趨于禽門鬼道，自速其喪魂亡魄而斬絕宗祠也。”¹⁰與維新派如出一轍，金天翮同樣從國家民族存亡的角度強調纏足帶來的危害，呼籲廢除這一“惡現象、惡習俗”¹¹的必要性。

當然，擺脫舊俗是為了獲得新生。金天翮希望女性能夠在掙脫封建桎梏之後，恢復自身本該擁有的權利，即“入學之權利”“交友之權利”、“營業之權利”、“掌握財產之權利”、“出入自由之權利”、“婚姻自由之權利”¹²及參政權。發展教育正是讓理想化為現實的關鍵所在，所謂“教育者造國民之器械也。女子與男子，各居國民之半部分，是教育當普及，吾未聞有偏枯之教育而國不受其病者也。”¹³為此他積極倡導女子教育，希望借此讓女性洗心革面、脫胎換骨，成長為擁有高尚純潔的氣質、充滿愛心、熱衷于公益事業、對國家建設充滿激情的優秀國民。

如果說維新派是將“女學”與“纏足”放在二項對立的思維中做“揚”與“抑”的處理，革命派則將此邏輯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將“女學”與包括“纏足”在內的所有舊思想及習俗對立起來。不僅如此，不同于維新派的諄諄教導、循序漸進，《女界鍾》的言辭激烈，將以往女性所有視之為“美”的思維及習慣全盤否定，不留一絲余地。當然，這種痛定思痛式的批判及訴求，就是要竭力建構出一種全新的女性形象，一種與過往截然不同的“女性美”。《女界鍾》突出、放大了教育的社會功能，強調唯有教育才是讓女性從封建束縛中解脫出來，告別以往愚昧無知的傳統女性規範的有效路徑。當然，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節，對女子教育的大力宣揚，是為了謀求女性價值觀的轉換，而這又直接指向了國家民族的振興。

與革命派的激昂論調相伴的，是其建設女學的熱情。其中尤以1902年冬由蔡元培、林獬、陳範等人創辦的上海愛國女學最具影響力。顧名思義，該校將培養愛國主義、富于革命精神的女性作為辦學宗旨。其他如上海城東女學社、宗孟女學堂、浙江愛華女校、明華女學校、嘉興愛國女學社等都是把革命思想與創辦女學結合起來的產物。

3.3 士紳階層的積極參與及女學示範效應的初步形成

維新派、革命派人士通過著書、出版刊物、積極實踐等方式大力宣揚“廢纏足、興女學”，加上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顯示出的改革姿態帶來了比較寬松的政治氛圍，以開明士紳為主力軍的興辦女學堂運動應運而生。1902年，曾任上海地方官的開明士紳吳懷疚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私立女學——務本女塾。此後，儘管圍繞著興辦女學，開明派與守舊派之間展開了相當激烈的鬥爭，有些女學堂遭到媒體的誣蔑、誹謗，更有甚者受到中央、地方政府的查封，但各類女學堂還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北京、天津、南京、漢口、長沙等地。北京的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天津的嚴氏女塾、南京的旅甯女學、漢口的淑慎女學、長沙的湖南第一女學堂等一批日後著名的女學堂均誕生在此時。一

⁸金天翮《女界鍾》，p. 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⁹金天翮《女界鍾》，p. 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¹⁰金天翮《女界鍾》，pp. 15-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¹¹金天翮《女界鍾》，p. 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¹²金天翮《女界鍾》，pp. 50-5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¹³金天翮《女界鍾》，p. 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言以蔽之，在地方開明士紳的積極推動下，女學堂建設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氣象。

然而，由于缺乏統一規章制度的管理，類型豐富層次多元是這一時期女學建設的主要特點。廖秀真的研究（1988）顯示：因出資方的不同，可以分為私立、公立及官立女學堂。它們之間在學生數量、規模方面均相去甚遠。私立學堂一般規模較小，學生人數多則 20 到 30 人，少的僅有 5、6 人。與此相異，公立學堂規模偏大，有的達到了數百余人。從教學程度及內容來看，又存在小學堂、師範學堂、專科學校及職業學校等多個層次。僅拿職業學校來看，從女子中西醫學院、產科女學堂到女工傳習所、工藝女學堂、女子桑蠶學堂等，涵蓋的內容可謂豐富。此外，各省之間的女學建設也存在較大差異，以 1906 年為例，直隸、江蘇兩省以學堂數量多成為女子教育最發達的地域，而在陝西、廣東、雲南、吉林、甘肅、新疆等地卻沒有一所女學堂。

縱觀這一時期開明士紳階層的女學建設，首先要直面守舊派的質疑、攻擊，同時作為國家制度政策之外的“野草”，其辦學類型、層次、規模、教授內容等各不相同，且地域差距顯著。換句話說，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此時的女學缺乏賴以生存的優良土壤及環境，甚至時時要面臨被踐踏和破壞的危險。儘管如此，各地女學堂的不斷湧現，充分彰顯了其生機勃勃的活力和發展前景，清政府將女學制度化的構想及實踐正是這一現實最好的腳注。

4. 女學的制度化與近代女性價值觀的確立

如果說傳教士是推動女性價值觀轉變的始作俑者，那麼官方的認同與許可——女學的制度化則對女性價值觀的重構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衆所周知，1904 年《癸卯學制》的頒布與實施標志著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國的確立，對於近代化人才的培養而言可謂意義深遠。那麼這部學制對於女性而言又意義何在？

“女學原不僅保育幼兒一事，而此一事為尤要；使全國女子無學，則母教必不能善，幼兒身體斷不能強，氣質習染斷不能美。蒙養通乎聖功，實為國民教育之第一基址”¹⁴。清政府從“母教”的角度肯定“女學”的重要性。

但是，對設立女學堂一事卻明確表示反對。“中國此時情形，若設女學，其間流弊甚多，斷不相宜。”所謂“斷不相宜”之處，即“惟中國男女之辨甚謹，少年女子，斷不宜令其結隊入學，遊行街市；且不宜多讀西書，誤學外國習俗，致開自行擇配之漸，長蔑視父母、夫婿之風”。規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識應用之文字，通解家庭應用之書算物理，及婦職應盡之道，女工應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無益文詞概不必教；其幹預外事、妄發關係重大之議論，更不可教。”¹⁵

清政府從為國民提供“優質”教育的角度出發，“發現”母教的重要性，進而確認了對女性實施教育的意義所在。但同時考慮到如果認可女子學校教育的合法性，就意味著女性不僅可以“拋頭露面”，進入公共場所，更可藉此拓展視野，成就獨立的見地與思想。這不僅是對“男女授受不親”的挑戰，更為甚者，是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一傳統的倫理綱常的冒犯，這是清政府深感恐懼更要極力避免之事。一方面從培養“優質”國民的角度認為女性受教育的意義重大，同時深感照搬西方、日本近代女子學校教育對傳統禮教的衝擊及“危害”，于是就有了所謂由其母親或乳母在家庭內部實施教

¹⁴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p. 396（1991）

¹⁵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pp. 394-396（1991）

育的折中之策。

針對“家庭教育”應采用何種教科書問題，清政府提出“應令各省學堂將《孝經》、《四書》、《列女傳》、《女誡》及《教女遺規》等書，擇其最切要而極明顯者，分別次序淺深，明白解說，編成一書，並附以圖，至多不得過兩卷，每家散給一本；並選取外國家庭教育之書，擇其平正簡易，與中國婦道、婦職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學》之類），廣為譯書刊布。其書卷帙甚少，亦宜家置一編。此外如初等小學字課本及小學前二年之各種教科書，語甚淺顯，地方官宜廣為刊布。”¹⁶隨意列舉出一些傳統女教的數目及外國書籍等，缺乏縝密的思考和規劃，僅停留在泛泛而談的空論階段，是這個“家庭教育”政策的特點所在。

作為清政府正式實施的第一個學制《癸卯學制》包括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整套體系，卻將女性排除在體系之外，認為“家庭教育”是最合適的形式。論及該如何實施“家庭教育”時，並未從教授形式、內容、層次等方面給出明晰、確切的答案。儘管存在諸多“硬傷”，清政府從近代國家建設的角度對女性受教育給予了肯定，為其日後倡導女學譜寫了序曲。

《癸卯學制》公布實施後僅三年，1907年學部提交的《奏定女學堂章程折》中，論及女學建設時指出：

方今朝廷銳意興學，兼采日本、歐美規制，京外臣工條奏請辦女學堂者不止一人一次，而主張緩辦者亦復有人。臣等每念中外禮俗各異，利弊務宜兼權。自欽派學務大臣以至設立學部以來，歷經往復籌商，亦復審慎遲回，未敢輕于一試。……惟近日臣等詳征古籍，博訪通人，益知開辦女學，在時政為必要之圖，在古制亦實有吻合之據；且近來京外官商士民創立女學堂者所在多有。臣部職任攸關，若不預定章程，則實事求是者既苦于無所率循，而徒務虛名者或不免轉滋流弊。……其已開辦各女學堂，務須遵照此次奏定章程，以示準繩。¹⁷

從反對到有感于設立女學的必要，清政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促使這一轉變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各地創辦女學堂之風已勢不可擋。換言之，為了控制不可逆轉的局勢變化，清政府改變了態度。試圖通過制定規章制度控制管理民間女學堂，清政府轉而對女子學校教育予以承認。《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學科程度章》中，清政府對發展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做了如下闡述。

家國關係至為密切，故家政修明，國風自然昌盛；而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禮法。又女子教育為國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學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為補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賴賢母；欲求賢母，須有完全之女學。凡為女子師範教習者，務于此旨體認真切，教導不怠。¹⁸

家庭的和諧、美滿需要女性知書達理，這就要求她們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僅如此，未來國民的培養、良好的家庭教育需要“賢母”完成，女子教育正是培養“賢母”不可

¹⁶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pp. 395-396（1991）

¹⁷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p. 575（1991）

¹⁸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pp. 576-577（1991）

或缺的關鍵。這一次，清政府擺脫了傳統倫理道德的束縛，對於開設女學給予了充分肯定，當然，這其中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勉強，有為事實所迫的言不由衷。也正因為如此，僅為女性提供了兩個層次的學校教育，即：小學及“以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並講習保育幼兒方法”的師範教育。具體地說，《癸卯學制》中清政府為男子制定的學校教育由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實業教育三條主幹構成，其中的普通教育大致可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個階段。與此相較，女子學校教育零散不成系統。同時，《女子學堂章程》中規定女子最高教育機關是女子師範學堂，其僅相當于男子中等教育程度。

儘管存在上述諸多缺陷與不足，但是，從政策層面而言，女子學校教育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清政府對創辦女學態度的轉變，無疑對女子學校教育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據統計，1906年、1907年、1908年的女學堂數量分別為245所、402所及512所，女學堂學生人數1906年為6,791人，到1907年、1908年分別達到14,658人、20,557人（廖秀真，1988：224-228）。與女學政策頒布之前的1906年相比，1907年女學堂數量增長6成多，1908年增長了一倍以上。同時，與上述數據相呼應，女學生人數也呈現激增的趨勢。這些數據一方面說明近代女學的成長和壯大，更為重要的，它意味著近代女子學校教育觀念逐步深入人心，評判女性的新價值觀就此確立起來。

5. 結語

至此，本文探究了晚清女性價值觀轉變的曆史軌迹。西方傳教士對纏足習俗的質疑，試圖通過創辦女學改造中國女性的思考及實踐，預示著轉型序幕的開啓。其後，維新派、革命派從救亡圖存、建設近代國家的角度積極倡導“廢纏足、興女學”運動，其論調得到全國各地開明士紳階層的響應，興起了“廢纏足、興女學”熱潮。儘管其間因戊戌變法的失敗遭遇挫折，但是曆史的車輪已不可逆轉。大勢所趨使得清政府最終不得不放棄“男女授受不親”等傳統規範，向天下昭告女子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清政府的初衷在於通過建章立制予以約束與控制，而非促進女學建設，但是，女子學校教育就此獲得了官方的正統性及話語權。

換言之，在西方傳教士拉開女性價值觀轉型的帷幕之後，維新派、革命派的大力宣傳、全國各地開明士紳的積極響應，最終使“纏足”漸漸失去約束力，而讓女學成為“女性美”的核心，成為標記女性身份的新手段。從質疑纏足到倡導女學，“婦女問題”這個曆史的盲點成長為清末國家存亡議題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提出婦女問題（婦女是“問題”），是為了尋找一條救國的途徑，婦女是載體/手段，強國是目標。”（王政，2004：178）換言之，置身于民族危亡如影隨形的20世紀初年，知識分子滿懷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渴望尋覓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女性解放”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被提出、被呼喚出來，被描述為實現這一民族使命的有效路徑，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脈絡下，“興女學”成為知識分子眼中救贖女性進而救贖國家的一劑良藥。

儘管女性問題的提出有其鮮明的目的性，但是，伴隨著近代女子學校教育價值的“被挖掘”與“被發現”，其順利成章地成為知識分子重塑女性的重要依據，亦取代纏足成為“女性美”的新標準。價值觀的轉變讓女性獲得了步入社會公領域的權利，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出現在學校、社交場所等以往的“禁地”。從這層意義而言，近代女子學校教育價值被呼喚、被倡導的社會文化意義不可小覷。換言之，在社會變遷的曆史時刻，除了作為一個政治符號肩負著救亡圖存的重任，其承載的社會文化功能及內涵亦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 [1] “論纏足與女學之關係”，大公報（1905-11-19）
- [2] 俞慶棠“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女子教育”，李又甯、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台灣商務印書館，pp. 343-377（1981）
- [3] 廖秀真“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1897—1911）”，李又甯、張
- [4] 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第二輯》，台灣商務印書館，pp. 203-255（1988）
- [5] 戚世皓“辛亥革命與知識婦女”，李又甯、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第二輯》，台灣商務印書館，pp. 551-576（1988）
- [6] 梁启超《飲冰室文集》（第1冊、第2冊），中華書局（1936/1989）
- [7]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8]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三集》，稻鄉出版社，pp. 183-246（1993）
- [9] 呂士朋“辛亥前十余年間女學的倡導”，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三集》，稻鄉出版社，pp. 247-262（1993）
- [10]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 [11]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12] 夏曉虹著，清水賢一郎・星野幸代訳，『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朝日新聞社（1998）
- [13] Ko, Dorothy,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 [14] 胡思“〈女界鍾〉作者真名考”，《檔案與建設》11月，pp. 25-26（2003）
- [15] 金天翮《女界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16] 高嶋航“天足會と不纏足會”，『東洋史研究』第2期，pp. 88-125（2003）
- [17] 徐宏慧《金松岑傳》，蘇州吳中文化（2003）
- [18] 高嶋航“教會と信者の間で—女性宣教師による纏足解放の試み”，森時彦編『中國近代化の動態構造』，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pp. 273-309（2004）
- [19] 東田雅博『纏足の発見：ある英國女性と清末の中國』，大修館書店（2004）
- [20] 王政編《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21] 楊念群“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對女子纏足由“美”變“醜”曆史進程的多元分析”，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河南大學出版社，pp. 1-50（2004）